

儒学对元代蒙古族作家汉文创作的影响

娜日雅

(内蒙古师范大学 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2)

摘要: 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 在元代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元代蒙古族作家汉文创作深受其影响。可以说, 民族文化的积淀与儒家传统思想铸就了作家的人格品性。他们将关注现实的热情、积极进取的精神融入到了作品之中。

关键词: 蒙古族作家; 汉文创作; 儒学

中图分类号: I207.9 **文献标识码:** A

元代蒙古族作家大多师从于名士硕儒, 长期居住在蒙汉杂居的都市, 有的甚至自幼长于汉地。因此可以说, 民族文化的积淀与儒家传统的思想铸就了他们的人格品性。蒙古族作家接受了儒学中积极的因素, 并将儒家“兼善天下”、“济苍生”、“安社稷”的思想融入作品之中。另外, 就纵向角度讲, 师法儒家之进取精神也是蒙古族作家继承儒学传统文学观的表现形式。思想家孟子曾提出“以意逆志”的诠释古代典籍的原则, 其要义是指在理解古代典籍时, 可以以己之意随意领会作者的志趣倾向, 掌握作品的精神实质。我们都知道, 只有从内心深处出发的、不停留于外在形式的作品才算好的作品。《诗经》、《楚辞》、《杜诗》都是儒家诗学经典, 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的诗歌呈现着深刻的人民性, 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的关心政治、为忧国忧民思想深深浸透在其作品之中。“影响并不限定在个别的细节、意象、借用甚或出源等问题上, 虽然他可以包括它们, 而是通过艺术创作呈现出某种渗透, 某种有机的融合。”^[1]元代蒙古族作家正是将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大同精神渗透到作品之中, 并将其化解为积极进取的精神, 忠君报国的意识, 深刻的人民性体现在作品之中。元代蒙古族作家师法古人精神表现出其一般性特点。他们的汉文创作既有咏史、咏物诗, 又有描写自然风情和人民生活的诗, 也有政治诗, 可谓是形式多样, 体裁丰富。任何民族、任何时代, 只要是进步的作品, 所传达的精神就是一致的, 那就是对国家社稷的关注。另外, 元代蒙古族作家的师法古人精神又表现出其特殊性。也就是使用非本民族语言来表达他们的情感。

儒经中的《诗经》是中国文学的光辉起点, 古人的文学创作精神是基于儒家思想的, 诗人对国家社稷的关注恰恰又是儒学精神的体现。如果说“宗唐复古”是儒家传统文学观的继续, 那么继承古人精神也是继承儒学思想的体现。元代蒙古族作家是如何将这种精神带到汉文创作中去的呢? 作品所反映的思想就是最有力的佐证。

一、人民性的体现

以民为本,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主导地位。孔子的“惠民”、“安百姓”, 以及孟子的“民贵君轻”, 形成了儒家文化的民本主义传统。在儒家文化各个时期的发展中一以贯之。从“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到“家事、国事、天下事, 事事关心”; 从“位卑未敢忘忧国”到“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4], 为民担忧始终是儒家所追求的内在精神实质, 它具有协调和稳定社会伦理秩序的功能。人性的完善或人的道德完成, 也需要这种精神的实践。忧国爱民是对全社会提出的公德要求。也是历代儒者所遵奉的行为准则, 它是儒家“仁者爱人”、“泛爱众”、“安百姓”的具体表现。

元代蒙古族作家的诗作体现了深刻的人民性。萨都刺是元代著名诗词名家之一。其作品虽以宫词而著名, 但其同情人民疾苦的诗作在同代人的作品中实属罕见。他“登科第、入宦海、虽官仅八品, 屈居下尊, 然而他汲取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积极入世之精神, 关注国家之兴衰,

纲纪之立废，理存道义而陈实事，讽喻是非而咏篇章。传统文化的积淀和儒家学说的影响铸就了他的人格品性，也给他的创作带来了异于同时代作家的个性特征。”^[2]而其作品所体现的民本精神正是这种个性特征的体现。萨都刺将这种精神发挥到了极至。他的爱民思想是以怨刺、咏物、征役诗的形式体现的。

萨都刺的咏物诗，浸透着深厚的人民感情。这些诗借物咏寓，以小喻大，表现了一代作家对时局的关注和对人民的同情。

如萨都刺的《雨伞》：

天如轮，合如束，剪纸调膏护秋竹。
日中荷叶影亭亭，雨里芭蕉声簌簌，
晴天却阴雨却晴，二天之说诚分明，
但操大柄常在手，覆尽东西南北行。

此诗将撑伞者、伞柄、老百姓分别比做人民的父母官、权利和避雨者，表达了统治阶级为民做主，犹如撑开一把大伞一样，能够为老百姓遮挡风雨。作者借一把小小的雨伞，寄托了宏大的理想，表现了作者对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老百姓的同情。

萨都刺的怨刺诗更多地体现了民本思想。对天灾人祸的描写，他善于运用强烈的对比来表现。与统治阶级的腐化对立的，是劳苦大众的苦楚。一首《早发黄河即事》揭露了当时的社会矛盾。“长安里中儿，生长不识愁。朝驰五花马，暮脱千金裘。”又“岂知农家子，力穡望有秋。短褐常不完，粝食常不周。”“以上充国税，以下祀宋楸。”“饥饿半欲死，驱之长河流。”表现了作者对人民艰苦生活的无比同情；同时又抒发了不能为国分忧的感叹，表现了作者无能为力的急切心情。在描写劳动妇女命运之诗篇中，这一思想得到格外凸现。如《鬻女谣》一诗，“绣衣貂帽白面郎，七宝雕笼呼翠羽”、“金带紫衣郡太守，醉饱不问民食艰”时，人民却“道逢鬻女弃如土，惨淡悲风起天宇。荒村白日逢野狐，破屋黄昏闻啸鬼。”这种鲜明的对比，揭露了巨大的贫富差距，更是体现了作者为国担忧、为民不平的心情，最后他道出了“愿逢昭代民富腴，儿童拍手歌康衢”的愿望。

从萨都刺的征役诗，可以看到当时连绵不断的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过居庸关》引发了作者对战争的愤恨，同时描述了人祸带来的灾难，“古来几多壮士死，草根白骨弃不收。冷雨阻风泣山鬼。道旁老翁八十余，短衣白发扶犁锄”等几句极具感染力，最后四句更是道出了作者“上天胡不呼六丁，驱之海外消甲兵。男耕女织天下平，千古万古无战争”的愿望。《谩兴》一诗，通过刻画战争、天灾给人民带来的“去岁干戈险，今年蝗虫忧。关西归战马，海内卖耕牛”的痛苦，表现了对时局的忧虑和关注。萨都刺也用题画诗的形式抒发意志，如《织女图》以织女的柔美形象与所织图案的美好，隐喻夫妻的恩爱，而残酷的战争要破坏这种幸福。因此，萨都刺再次做妇女的代言人，执笔泄愤。全句虽较平淡，但体现的心声却极富感染力。元文宗至顺元年（1330年）云南出叛乱，朝廷调兵进剿，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灾难。萨都刺以此为题，诗一首《征妇怨》，以思妇对服役丈夫的思念和联想来嘲讽狼烟的危害性，尤其“梦魂暗烛蝴蝶飞，觉来羞对窗前月。窗前月色照人寒，迟迟钟鼓夜未阑”一句可称是绝唱。

民本思想无论在元代蒙古族汉文创作中抑或，在蒙文创作中都同样得到充分体现。《金帐桦皮书》和《阿莱钦柏之歌》是流传于蒙古民间的较有影响的歌谣。《金帐桦皮书》是一首写于十三世纪末十四世纪初，采用母子对唱形式的民歌。歌中描写了一位牧民母亲对将要服役的儿子临行前的教诲和儿子在远方思念母亲和家乡的故事。作者通过母亲和儿子互念之情，揭露了战争给蒙古人民带来的痛苦，表现了其深刻的人民性。《阿莱钦柏之歌》题材同样取于十三世纪末十四世纪初的战争，描写了阿莱钦柏役前依依惜别之情。这两首诗有异于同时代的处处赞美成吉思汗的创作，反映人民生活的现实性使其显得别具一格，似乎也说明了创作者受中原诗歌影响的可能性。

萨都刺继承了我国诗歌现实主义的传统。反映现实，对一个本身是官吏的作者来说，实在难能可贵，他抱有远大的政治理想，即使在颠覆流离中也没有一刻忘记国家和人民，他忧愤的歌唱，一字一句都倾泄了深沈的感情，他忧国忧民的思想 and 追求进步政治的理想始终结合在一起，说明了诗人思想的进步性与深刻性。

除萨都刺的诗歌之外，民本思想在其他作家的诗作也有所体现。泰不化著有一首《卫将军玉印歌》。作者因从地下掘出的玉印而起兴，将汉武帝时名将卫青的爱国功绩与现实联系在一起，揭露了战争带来的“祁连山下战骨深，中原父老泪满襟”的危害，最后提醒人们“天荒地老故物存，摩挲断之吊英雄”以予警示。

二、积极入世精神

有元一代，儒学主张重视现实、力求改善现实、追求天下大同的积极“入世”精神也给蒙古社会带来现实的影响，尤其影响了蒙古族文人士子。元代蒙古族作家用充满积极进取精神和忠君报国意识的诗歌对此进行了诠释。“进取”是游牧民族传统的的精神元素之一，但这种“进取”是建立在对自然界的征服过程之中的。而在中原文化侵入的十三世纪，蒙古族作家的“进取”转向建立在政治理想之上的“进取”。元代蒙古族作家或帝王出身、或科第出身、或贵胄世家之出身，他们即帝祚、进科第、入宦海无非是为了追求进步的政治理想。而他们诗歌中的忠君报国意识正是这种理想的体现。

元代蒙古族作家创作了不少反映积极进取精神的诗篇。在这一点上帝王作家文宗图帖木儿，顺帝妥欢帖睦尔以及丞相伯颜的诗句比较突出。

伯颜的诗歌多属军旅题材，如《俸使收江南》：

剑指青山山欲裂，马饮长江江欲竭。

精兵百万下江南，干戈不染生灵血。

此诗写于元军伐宋途中，伯颜写此诗时正值而立之年，处于人生的黄金时期，因此建功立业、实现人生价值的进取精神可谓最为旺盛。在这里作者用夸张的手法，描写元军伐宋的浩大的队伍，并用“干戈不染生灵血”表现了对帝王的忠诚和高尚的人格。而这种人格魅力是儒家所推崇的“仁”的具体体现。其喜悦之情蕴涵着自己踌躇满志和继续向前的积极进取精神。另外一首《鞭》仍作于南征途中：

一节高兮一节低，几回敲凳月中归。

虽然三尺无锋刃，百万雄狮属指挥。

此诗运用比兴手法借物抒情，以鞭指挥大军前进的方向，表现了作者军权在握，勇往直前的精神。另外作于北归途中的一首《过梅岭冈留题》流露了作者忠贞廉洁，风雅自乐高尚情操。“担头不带江南物，只插梅花一两只”一句体现了作者以完美人格为理想的儒者胸怀。

元文宗图帖木儿自幼谪居海南，受汉文化影响颇深，他本人通晓汉文，尤其对汉族古典诗歌有浓厚兴趣。1328年泰定帝殁，图帖木儿北上大都继承帝位。途中作七律《自建康之京都途中偶吟》一首：

穿了毳衫便著鞭，一钩残月柳梢边。

两三点露滴如雨，五六个星犹在天。

犬吠竹篱人过语，鸡鸣茅店客惊眠。

须臾捧出扶桑日，七十二峰都在前。

此诗借景抒情，以春天黎明前的景色预示自己光明的前途，而黎明过后是清晨，所谓“一

年之际在于春，一天之际在于晨”，诗歌似乎也体现了作者对光明的憧憬，也就是承袭帝位的来临，体现了作者立志君临天下，有所作为的精神境界。

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应天府称帝，八月明军入大都，顺帝妥欢帖睦尔的一首《答明主》正是为答复明太祖招降书所写。“信知海内归明主，亦喜江南有俊才”两句既有明显禅让诚意，也有借隐喻而宣称的信心。“归去诚心烦为说，春风先到凤凰台。”成为顺帝宽阔的胸襟和慷慨人格的体现；不卑不亢的精神又恰恰是儒者“中”“和”态度的表现。

顺帝的愿望最终未能如愿，他于1370年歿于应昌府。其长子爱猷识理达腊继续统领元朝残存的土地，聚集余众，准备复兴。在此期间，爱猷识理达腊作《新月》一首：

昨夜严陵失钓钩，何人移上碧云头。

虽然未得团圆相，也有清光照九州。

作者用浪漫主义手法，借新月寄托亡国哀思。将新月喻作大元仅存的土地，表现了国虽亡而志不降，地虽失而心不凉的精神境界，对比新月和元朝，表明了月缺可圆，国亡可复的坚定信念。

三、忠君报国意识

元代蒙古族作家的汉文创作当中反映忠君报国意识的作品为数最甚多。萨都刺等作家借历史人物来表达政治报负。如萨都刺的一首《大同驿》：

题诗洒墨江东驿，笔力犹能挽怒涛。

飞骑将军朝出猎，打门县吏夜催徭。

天高路远心如火，也永愁多独过桥。

却忆玉堂诸学士，凤池东畔珮声遥。

此诗用“天”隐喻朝廷，将“路”比作仕途，把“飞将军”和自己相联系，诉说无法施展抱负之惆怅。自己虽人不在朝廷，心却时刻牵挂着朝廷。全诗平淡地烘托出作者忠君报国的理想。萨都刺常将自负才华而怨艾无人赏识的情绪带入诗中。他曾在《南安道中》感叹自己“不堪岁月如流水，赖有文章似泉涌”，因此在《题瘦马图》一诗中，借千里马终被伯乐所知之典故，希望人才终将被埋没，表达了自己终究一天会被远见卓识之人所赏识的愿望。《登歌风台》一诗，首先批判刘邦的用人之误，然后道出“只今宇宙极四海，一塌之外难支撑”的忧虑，可是自己又离帝王太远，怎么能“安得常年在乡土”？表现了作者欲建功业的愿望，同时也提醒当今的君王不要再重复旧辙，而伤及到人民的利益。

有些作者诗题怀古，实是抒发自己的感情。阿鲁威的一首《怀古》道出了有关英雄的话题。在作者看来，曹操、刘备、孙权、诸葛亮等人之所以被称为英雄，就因为他们持有相同的信念，即对自己国家的忠诚，这也是作者的信念，英雄是他的一种向往。称赞古人之功德是其表现政治抱负的体现。笃列图的《范文正公书伯夷颂并札卷》：

韩文称颂伯夷贤，黄素真书庆历年。

月照明珠还合浦，春风长共义庄田。

此诗以伯夷颂为主线，将伯夷的高尚气节和韩愈的远大见解，以及范仲淹的细腻工力联系起来，表达了宝物最终会遇伯乐，同时也流露了自己最终会被重用的政治幻想。达实帖木儿《五丈秋风》：

八阵图荒认旧痕，当年蜀将驻三军。

出师不遂中原志，老树寒烟锁暮云。

本诗以凭吊三国时的诸葛亮为起点，感慨他的统一事业未能如愿，借此来警示现实中的元朝应珍惜来之不易的统一大业，表达了对国家深深的担忧。

元代蒙古族作家还通过赞美同时代的人来表达忠君报国意识。泰不华就是其中之一，他的《寄同年宋吏部》一诗，通过赞美宋本平坦的仕途，慨叹自己境遇不佳，被时代所淘汰，表现了终究要实现的政治抱负。《春日宣则门书事简虞邵庵》一首诗则通过对泰定帝为新进士举行琼林宴的热闹情景的描写，赞美皇恩之浩大和未来才俊之才华，隐约流露了作者也欲同他们一样为国家效力的政治愿望。其另外一首《送新进士还蜀》：

金络丝缰白鼻騮，锦衣乌帽小宫花。

临邛市上人争看，不是当年卖酒家。

此首诗描写了新进士的显贵形象。后两句借典故比喻新科进士成名后受到群众羡慕之情景，表达了作者报效国家的积极愿望。《春日次宋显夫韵》一诗触景生情，感叹自己虽有才学，却无用武之地，体现了作者力图有所作为的愿望。

阿鲁威也在《遗怀》一诗中表现了这种情绪，他用“灵修”喻神明的国君，用“佳人”喻贤明的有才之人，感叹爱国诗人不被重用。表现了自己因无法施展政治抱负的惆怅、怅惘的心情。

有的作家将接近皇帝，为皇权效力视为至高无上的责任。买闾在《和年弟闻入京城杂诗》中，用“紫薇花下客，争赋夺袍诗”赞美了群臣才华，可自己却“惭无董贾策，三伏献明光”，那么“何时近帝袞”呢？如果实现，一定“身惹御炉烟”。作者通过以上联想表达了能够接近皇帝，并为朝廷作出贡献的热切愿望。泰不华《绝句二首》（二）：

金吾列侍拥旌旄，五色云深雉尾高。

视草词臣方退食，内宫传敕赐樱桃。

这首诗写自己侍奉皇帝起草诏令而得到赏赐后的喜悦心情，通过对皇帝尊贵形象和自己喜悦心情的描写，表现了自己对皇帝的无比崇敬和欲为国家效力的政治愿望。

“天人合一”观念在元代蒙古族作家的山水诗作中有所体现。而和以往不同的是，这类诗作在表现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观念之余，更多的是抒发作者的政治抱负。如文宗图帖木儿的一首《登金山》：

巍然块石数松支，尽日游观有客从。

自是擎天真柱石，不同平地小山峰。

东连舟楫西津渡，南望楼台北固钟。

我欲倚栏吹铁笛，恐惊潭底久潜龙。

此诗写的是游兴，并且也花费一定笔墨描绘了自然景观。然而其间也蕴含着作者君临天下的迫切欲望。月鲁不化的《游天童山》虽为游仙之作，却抒发了自己“晨钟暮鼓思补抱”的忠君报国思想。也表现了作者希望“行看四海甲兵消”的政治愿望。

纵观元代蒙古族作家的汉文创作，其作者包括帝王、科第、贵胄等不同身份、不同生活经历、以及不同性格、性别的作者的创作；从体裁说，有抒情、叙事、讽喻、诵赞等各种文学样式，而其题材内容更是多种多样，有的写政治、行役、战争，有的写爱情、婚姻、民俗等。作品所体现的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正是儒家“风雅”精神的延续，作者这种积极的创作态度，赋予其作品深厚的艺术魅力。

参考文献

- [1] 韩钟文. 中国儒学史[M].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1998.
- [2] 白·特木尔巴根. 古代蒙古族作家汉文创作考[M]. 呼和浩特: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出版, 2002.
- [3] (元) 萨都刺. 雁门集[M].
- [4] (元) 苏天爵. 国朝文类[M].
- [5] 王叔盘, 孙玉溱选注. 古代蒙古族汉文诗选[M].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1.
- [6] 王叔盘, 孙玉溱等选注. 元代少数民族诗选[M].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4.
- [7] 陈衍. 元诗纪事[M].

The Influence of Confucian on Mongolian Writers Chinese Creation in the Yuan Dynasty

NA Ri-ya

(Department of Chinese, Inner Mongolian Normal University, Inner Mongolia, Hohhot, 010022)

Abstract : As the Reenel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Confucian got extensive dissemination in the Yuan Dynasty. And Mongolian writers Chinese creation was influenced deeply by it we can say Mongolian writers character comes from Natioality's culture and traditional thought of cofucian. So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fact and positive spirit was mixed in to their works.

Key words: Mongolian writers; Chinese creation ; Confucian

收稿日期: 2004-02-24;

作者简介: 娜日雅 (1975—), 蒙古族, 女, 内蒙古集宁人。内蒙古师范大学青年政治学院教师, 助教, 文学硕士。主要从事蒙古族古代文论研究。